



尋覓中華文化：對歐洲漢學史的一些看法

Gauting Herbert Franke 著

德國慕尼黑大學榮譽教授

古 偉 瀛 譯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89-95

本篇並不是要綜合歐洲中國研究的發展，也不是要對某些歐洲國家的漢學研究作一批判性的評估，或是對漢學研究的較小範圍的成就作一回顧。這些必須留給本屆漢學會議的論文來做。這次會議所列出的題目似乎頗可照顧到這點，也得指出，此處所提只是我個人觀點；它們不是基於將其理論化的結果，而是我一生在我的國家關心漢學，且有時並研究的結果而得到的看法。只有在會議結束後，才有可能發現在歐洲諸國中學術異同的程度。在漢學研究中，各國到底是否因在漢學初期特定的政治及社會背景，而有其不同的「國家風格」嗎？我們在何種程度上可說是有一獨特的歐洲漢學傳統？歐洲的學者是否在研究題材及方法上都有選擇的自由？還是他們有時不得不受制於規劃機構、政府部門或是政治團體？那些建立中國研究講座的政府或大學，其背後的動機又是如何？這些都是要深入瞭解歐洲漢學的起源及演變的重要線索。同時這些及其他許多的問題都可使我們免於自滿於不過是加上一點解釋的書目 (bibliographie raisonnée) 而已。現有的成就只是尚未寫出的歐洲漢學史的起步工作。¹

不過有一件事却是很確定的：如果曾經確有不同的「各國」漢學傳統模式或研究途徑的存在，那麼，如今也由於人與人和機構之間日漸增加的溝通而逐漸消失。大部份的人都知，漢學研究的人士不限於歐洲，也多少包括北美洲及遠東各地。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在學術交流上還有障礙存在，特別是語言學上的障礙。在本文稍後將作討論。

歐洲早期的漢學面貌

對於此會的招牌字「漢學」應該說幾句話，「漢學」是在十九世紀時造出的許多新知識領域之一。在英文中此字還算是很新的。1838年首先「漢學家」(sinologist) 這個字出現，不久之後(1857)又有一個目前已不太用的字「漢學人」(sinologer)，令人想起不太好聽的「占星人」(astrologer)。「漢學」(sinology) 一字意謂著「對於中國事物的研究」，似乎更是晚出，在1882年才正式出爐。因此，大約在1860到1880年間，這個希臘和拉丁字的混合體及其延伸出來的字義才被普遍使用。² 也就在這個時期，對於中文以及中國的研究逐漸被認可為一個學術的研究對象。

但在這之前的一或兩百年的情形並不相同。學識豐富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特別是耶穌會士，首先將中國事物介紹給歐洲人。雖然他們精通中文，並且所達成就迄今鮮能超越，但並不自認為漢學家。其中有些人甚至被任命為官員，而成為清官僚的成員。為這些人而言，其基本動機只是傳播信仰，研究中國的東西只是達到傳教目的的一種工具而已。而他們有關中國的出版品在十七、八世紀時在歐洲書市中頗被接受，且銷路頗佳，之所以如此，有一部份該歸因於巧合，因為這時期剛好也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所稱的「大發現的時代」。在歐洲思想界的精英對於世界遙遠的地方都有強烈的求知慾望。在那時若有膽子較大的非神職人員自行學習中文的話，多半這人是出於一種

譯著註：本文為傅海博教授在四月十七至二十二日在圓山大飯店舉行的歐洲漢學史國際學術會議中開場演講的大致內容，傅教授生於1914年，早歲攻讀漢學，曾任教慕尼黑大學，並擔任巴伐利亞科學院院長，現為慕尼黑榮譽教授，他本人為蒙古史專家，本次受邀為大會開場演講貴賓，惜因健康理由，無法親自前來，本文縱論數百年來歐洲漢學的源起、特色以及未來應努力的方向。全文約一萬字，今特譯出，以饗讀者。

當時相當普遍的好奇心，這種精神當時稱為「巴洛克」(baroque)，多才多藝是這種精神的主要特色。不過，不久一種新的向度開始出現了。中國文明所呈現的穩定及物質成就使歐人相信，即使是像中國這種非基督文化，也可以作為國家及社會安定及繁榮的基礎。中國成為由哲王統治的原型。此觀點在十七及十八世紀早期頗為流行，使得歐洲思想史家稱之為「巴洛克式的親華態度」。當然，歐洲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們從未來過中國，他們只是從耶穌會士的著作得到對華的瞭解。³

衆所周知，這種對中國的好感在某方面到了十九世紀被一種反感所取代。中國在此時被視為落後，極需向西方學習近代化，但到了二十世紀，又有了一種較不那麼輕視的看法。隨著西方價值的危機所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殘破，儒家及道家所呈現的「中華智慧」又流行起來了，特別是在德國。理論上，這只是舊調重彈，不過，並非最後一次。中國之作為一個西方一個可以取代西方的另一種選擇，一種可以拯救西方危機的救星，不久前還又出現過一次，雖然為期甚短，然而却是一些躁進的西方知識份子頗寄以厚望的。十八世紀時為喜愛中國的西方人所視為「大聖人」的孔子，如今換成了毛澤東。所有這些中國歐洲交流的幾個階段，不但反映著歐洲的思想界的趨勢，也同時影響著漢學的研究。⁴

漢學的起源

漢學之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主題在歐洲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其出現較印度學及閃族研究要稍晚。後二者其來源頗不同，長期以來希伯來及其他東方語都已成為教學的課目，這是為對抗回教的基督宗教護教學而產生的。而對印度的興趣則源自於發現梵文竟是印歐語系的祖先所促成的，尋根熱也伴著印度學的熱潮。在此並無意細述歐洲漢學的興起。大家都知道1814年是漢學的開始。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法蘭西學院隨著印度學講座之設立，也開辦了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及文學講座。該講座由年方二十七的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1832)擔任，他在1815年1月16日正式開講。這些都是發生在拿破崙帝國崩潰之時。為何在此動盪時期設立此講座的動機吾人並不清楚，歷史學家對此必然會感到有趣。回顧自1814年以來，所有擔任此位置的學者，無可否認，都是第一流的，不論法國國體如何，這種高水準都一直維持著，這也許得歸功於法國歷來盛行於文教機構中的精英主義的影響。

法國也是最早教授白話的歐洲國家。早在1795年就建立了國際東方語言學院，在此傳統之下，路易十四及第一

共和時即有了巴黎現代東方語學校(培訓翻譯員)的設立，1843年時漢文排入了課程。第一位教授是巴安多(Antonie Bazin 1799-1853)，他和雷慕沙及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一樣從未到過中國，但是由儒氏將白話傳給他。晚近華語老師多半延聘前任的外交官，其中較有名的是德微理亞(Gabriel Deveria 1844-1899，譯註：此人曾寫過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國安南邦交史)。

其他國家設立類似的機構較晚。在德國首任漢文教授是1909年在漢堡出現。嘉布蘭(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是一傑出的漢學家，此人幾乎以不合約定的情況下鑽研漢學，因為他在萊比錫的教學位置是普通語言學的課程。在英國情況也差不多。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牛津及劍橋將兩個主要的教授席次授與名外交家或傳教士如威妥瑪(Sir Thomas Wade, 1818-1895)、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然而，他們在這些學校的活動只不過是一些異國情調的裝飾罷了，並未植下深厚的學術根基。相反地，在沙俄則早在十八世紀就發展出了漢學研究的中心，其中俄國在北京的東方正教教士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⁵

為何研究漢學

雖然從事漢學學術研究與實用的白話漢語教學兩者可以在同一機構同時並存，但有必要將之區分。在這裏就有了一個史學家們很可以研究的好題目了，亦即比較研究每一國家或大學建立漢學研究的動機。這種比較研究將大有助於吾人對於這些國家的政治及思想環境的瞭解。吾人早已見到法國是在鴉片戰後才開始教授中文口語。從法國介入東南亞的觀點來看，此舉是饒富意義的。至於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吾人見到有三種密不可分的動機：貿易、外交及新教的傳教活動。而荷蘭則在十七世紀以來即是一個海外貿易的大國，日後成為東南亞的一個殖民國家。而俄羅斯之早早注意到中國其理由顯而易見。自從十七世紀俄國征服西伯利亞以來，俄即已成為共有千里國界的鄰國，俄國也是第一個與中華帝國簽訂正式條約的歐洲國家(1689尼布楚條約，1727恰克圖條約)，因而有極大的興趣去研究漢學及滿洲事物。而在日耳曼則情況十分不同，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有所改變。日耳曼在亞洲並無殖民地，而其對華貿易長期以來也是微不足道。所有十九世紀以來早期的漢學家們如柏林的施浩特(Wilhelm Schott, 1807-1889)以及在哥丁根的柏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 1802-1874)，隨後住在慕尼黑，都是有成就的漢學家，他們都無法以實用的目的來將其研究予以合理化；他們全都是純

粹出於學術的好奇。只有在德國統一之後，才有類似法國的東方語學院在1887年創立於柏林，稱為「東方語言研究所」(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而在大學中設立漢學教授，則是多年以後的事了。而此校之成立為俾斯麥所大力支援，故應視為德國貿易及殖民野心的產物。創校伊始，漢文即已包括在課程中。

上述簡短的敘述意在指出漢學研究的大致輪廓。在此脈絡中，有一現象頗值得注意。不論是在菲律賓的西班牙，或是在澳門的葡萄牙，早在十六世紀末葉，即已與中國接觸頻繁，然而據我所知，在這些充斥著航海家及貿易商的伊比利亞半島上，漢學並未受到學界的重視。甚至在十九世紀歐洲許多國家開始將漢學納入其學術範圍時，這兩國仍然沒有什麼漢學研究的存在。

雖然本文並非以處理近代漢學的發展為主要的部份，不過，我們仍應注意一件被忽視的現象，亦即二次大戰對漢學在北美洲的衝擊。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和中國是盟邦，共同對付日本，但在1949年後美國却是以中共為敵人。在美國的中國研究若無這些外在的因素，恐怕不會有如此的蓬勃發展。有一些我這一代的美國人是經由軍方管道初次接受漢文的訓練，而且之前並未曾有過漢學的教育背景。無論如何，直到1939年美國漢學界大部份還是由歐洲人當道。在第一次大戰前，哥倫比亞大學的漢文教授是德籍的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而1937年5月有一羣漢學家發表了一篇備忘錄，提出中國研究的必要性，該文件是由魏魯男(James R. Ware)、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雷辛(Ferdinand Lessing)以及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所共同簽署。這些人當中甘氏擁有柏林大學博士學位，雷氏是德國移民，而布氏則具有俄國背景(他從未申請美國公民)。⁶

專業人士以及圈外人

在十九世紀正當各大學日漸設立講座之時，有一主要的情況出現了，這就是專業化的傾向。愈來愈多的具有中國研究的學位並想以此技能謀生的漢學家出現了。今天這已是一般常規，但長期以來，一直到二十世紀初以前，往往漢學教授的位置是一些唸別科的人擔任。這些人是以外交官、傳教士或是總稅務司屬下的海關關員身份，在中國待了一長時期之後得了一些有關中國的知識而得此位置的。這裏只消舉出兩個例子就够了，一位是富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他原先具有一印度學的博士學位；另一位是福亞非(Alfred Forke, 1867-1944)，他擁有文學博士的學位。即使是今日，我們也可找到類似的情況，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經是一位傑出的生物化學

家，年青時曾被選為皇家學院的院士，但我們都視他為漢學家，以及皇皇鉅著「中國科學與文明史」的作者。若沒有在二次大戰時在中國擔任科學家的經驗，他會不會成為漢學家還是一個問題。對於德籍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而言，情況也很相似，他認為業餘者是專業者的前驅。

在此脈絡下我們不能忘記十九世紀時那些非專業學者的鉅大貢獻，如首位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張伯雍(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原是一位格倫諾堡的歷史教授；而揭開楔形文字秘密的主要奠基者，一位是古典語文法的教師葛德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 1775-1833)，另一位則是軍人兼外交官羅林森爵士(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1810-1895)。整體而言，在漢學領域中業餘者的貢獻也是很大的，此處所指的業餘者是那些不以研究漢學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紳士——漢學家」(gentleman-sinologist)，或是在工作之暇從事研究漢學的學者，前者如畢甌(Edouard Biot, 1803-1850)，其父為一有名的物理學家，受業於儒蓮門下。雖是以鐵路工程師為業，但後來放棄職業，獻身於漢學，將「周禮」首次譯成了西方文字。在本世紀我們還可加上亞瑟偉列(Arthur Waley, 1889-1966)以及羅鐸(Robert des Rotours, 1891-1980)。還有一些人本職雖忙，但在漢學界仍有重大貢獻。這些人在上個世紀有俄國華使館醫師的貝勒(Emil Bretschneider, M. D. 1833-1901)，在本世紀則有曾任荷蘭駐日本大使的高羅佩(Robert H. van Gulik, 1910-1967)。

在本文前面已提到早期漢學發展的政治、社會背景及架構。我們還可再加上個人的因素。在內容豐富的中國傳統中，人們之所以選擇某一方面而不選另一方面多少與當事人的生活背景有關，這種選擇不只是因為某一題目沒有人研究過或研究得不够充分而已。畢竟學者並非活在一純粹思維的氛圍當中。從這個觀點來看，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1905-1963)本身是納粹的受害者，他特別注意到傳統中國法律及社會中具迫害性的一面也就不足為奇了。而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90)在其研究上特別重視土耳其以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角色，也是因為他曾是安卡拉大學在1938到1948年間唯一的漢學教授。他自己的博士論文完成於1946—1947年，是寫有關於元朝的貨幣與經濟。而當時正是德國紙幣貶值到一錢不值之時，這種每天都感到的經驗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元朝末年通貨膨脹的日子。這些只是隨手舉出的個人經驗和學術之間的關係之例。當然，我們只要進一步研究每個作者的生平往往會更有類似的結果，而非作者在序中所言其作品的產生

經過的刻板敘述。無論如何，歐洲漢學家的個人背景不得忽視，且值得進一步去探討。而所有這些探討都將問到為何會想研究像中文這麼困關的題目。而每一位學者對此答案都將有所不同，有些似乎頗出人意料之外。個人認為對歐洲漢學家的生活及家庭之研究是一個的確值得探討的一件事。⁷

一些趨勢以及熱門的題目

歐洲漢學的發展情況將在這次會議中展現出來。可見的是會中的文章將看得出在方法上的轉變以及比較流行的趨勢。回顧十九世紀的漢學界，似乎是放了過多的力氣在中外關係以及鄰近的地區如中亞一帶。這種偏好正如法國名漢學家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所說的「膚淺」(épidermique)。今日情況當然已不同，中國本身已受到應有的注意。同時漢學已企圖將重心從「經傳注釋」的傳統以及「東方主義的夢魘」中擺脫出來。⁸ 以歐洲漢學而論，我們仍記得白樂日所批判的他所謂的某些漢學家所懷「搜集郵票」的心態。他是指那種只重視中國傳統中的奇異小事，反而忽視了整個中華歷史文明中較重要的問題。眾所週知，白氏曾倡導宋代的研究計劃，而且也是首位在歐洲主持國際漢學合作計劃的人。他的文章「漢學研究題目的選擇」(Choix de sujets sinologiques)，極具啟發性，1955年時先在同事友人間流傳，但在他去世後才出版。由於我們可以知道他所提的建議迄今多少已實現，還有多少仍是未來該繼續努力的，所以這篇文章今日仍值得一讀。⁹ 不管我們今日怎麼詆毀「經傳注釋」的傳統，無可否認，對於中國古典的譯註仍不失為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進路。翻譯仍是，也應該是有其價值的。使用中國古代的文獻，特別是文言文的典籍，從中尋找支持假設的線索自然是很吸引人的，因為這使得我們有機會去瀏覽西方學者未能完全理解的章句段落。

中文有多難？

這下就很自然地談到從前為什麼學者有時會誤讀典籍了。原因之一是在歐洲漢學初興之時，有人以為中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因而忽略了未標點的文句結構。今日吾人有大量的工具書協助正確瞭解典籍。而且由中國或日本出版的許多標點本的漢籍也使得我們先輩(或是我們自己)免於犯錯。不久前有一位學者主張，中文不像巴比倫文一樣難，因此我們不需要西方歷史學者的翻譯。¹⁰ 有人對此樂觀的看法表示異議。此處讓我引一段龍彼得 (Piet van der Loon) 1991年1月9日寫給我信中的話：「並不是由於缺少字典或參考書而發生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

，是由於對中文困難度的低估，畢竟這是一種錘煉了三千年的文字。我們的學生(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接觸文言文的時間不夠長，更談不上有什麼堅實的基礎可以精通它。沒有任何參考書可以取代十五年或二十年日夜誦讀或背誦古文的經驗，而這正是中國學者從年青時就開始做的。換言之，我們都想(或是被迫)在還讀不懂之前就處理一些學術性的問題，在還沒有會爬之前就要飛。」希望這段話能對那些認為歐洲或西方漢學的進展極為樂觀的人有提醒的作用。龍教授的話令人想起老一輩的德國漢學家韓艾理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對他的學生所講的話。他還是在上一代傳統漢學的訓練下調教出來的。他認為對古典經傳注釋的批判及翻譯是成為漢學家的先決條件。他總是強調精讀的重要性。這番言論今日似乎已經過時，但仍然值得好好想想。畢竟，如果這些古典那麼容易瞭解的話，為何中國學者花了這麼多功夫加以註疏？這些卷帙浩繁的註疏即證明龍教授的所言不虛。

滿文本之作為西方翻譯家的藍本的時代早已過去了，顯然滿文比漢文文言較方便。因為滿文是字母化，其名詞及動詞都有其豐富而精簡的語形，而且文句結構頗為一致。今日要一位漢學家順便學一點滿文會被視為太落伍了。不過，我們必須記得那些反對滿文作為輔助語的人沒有一位是懂滿文的。滿洲話作為一種輔助語如今已被日文譯本或是中文白話譯本所取代了。

語言障礙

以上所言多屬中文作為一種文字上的困難。在本文中還要簡單討論另外一層次的語言問題。在十八世紀末以前的歐洲，拉丁文仍和法文一樣是人們使用的書寫及瞭解的文字。十九世紀漢學興起後，德文和英文就和法文一樣成為學界溝通的工具。時至今日英文却似乎成了共通的語言，愈來愈多的學者寧用英文而不用其本國語言寫作。這就使得一些小國家的人不容易將其研究成果讓其他國家的人士分享。用芬蘭語、捷克語或是匈牙利語寫作必將限制其學術成果的流佈。此處並非要反對英文的宰制，因為我們也因此而受惠。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因而忽視非英文寫成的學術著作。無人能否認，用法文或意大利文寫成的著作在遠東很少人會去讀它或引用它。(當然，若已譯成英文則是例外)。即使是在歐洲，法文程度也降低到令人傷感的地步。四十年前當我剛開始教書之時，所有德國學生都會讀法文。今天已大不如前，然而，在此歐洲政治以及經濟共同體將要形成之際，這情況尤其令人遺憾。語言障礙所造成的溝通不良應該避免。

這些看法更適用於俄國。我們因此更應該感謝美國同

行會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漢學研究成果介紹給大家。¹¹然而，似乎沒有很多歐美的學者知道有一位俄國當代學者正出版帶有註釋的極佳的司馬遷「史記」譯本，可與當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劃時代的鉅譯 *Memoires Historiques* 比美。¹²另一方面俄國漢學家近來也在報導歐洲漢學界的趨勢及機構。¹³我們希望在此各種官僚障礙日漸消失之際，俄國與歐洲他國甚至世界的接觸及交流能更加強。

必須承認，比起過去數十年來，俄國在十九世紀的研究已大為歐洲漢學家所熟悉。在此舉兩例說明。我一度想細究西藏的歷史地理，曾找到一本盛繩祖等在1792年著的五卷「衛藏圖志」，再進一步探討才發現此書有一部份早被俄國神父亞金甫(Iakinf Bichurin, 1770-1853)譯為俄文。¹⁴數年後有一較完整及改正後的法文本由克拉普洛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出版。¹⁵第二個證明俄國學術為歐洲漢學界所熱烈接受的例子為俄國駐北京的東正教教士團從1852到1866年所搜集的學術論文。¹⁶其中首三冊是在1858年譯成德文。¹⁷此二例顯示俄國漢學著作往往在其出版後數年之間在俄國境外已開始流傳。今日在西歐的我們對於俄國的著作若能像在十九世紀那樣的譯出或是以摘要的方式流傳就很滿意了。在十九世紀時，俄國是被視為「科學共同體」中的當然成員。

誰讀我們的書？

如前所言，十九、二十世紀時漢學的一個特色是專業化。伴隨而來的是愈來愈多的學術中心的創立，而愈來愈多的漢學家出現。按照美國「不出版便滅亡」的格言，這些人若想維持其學術生命則必須勤於著述，以便在大學中佔一席之地。另一同等重要的現代漢學特色是分工化。今日「漢學家」此字涵蓋了許多不同的分科的研究者，從中國歷史、文學、科學、技術和宗教到語言學的研究，而語言學本身又分成好幾個部門，每門都有自己的行規及標準。這種發展當然不限於漢學，而是人文學科普遍的現象。從前的學科界定現今幾乎已失去其意義；印度學家或阿拉伯學家與漢學家所面臨的情況都差不多。就學術的水準提高而言，這種變化未始沒有好處，但却有較負面的影響。愈來愈多的專家寫給愈來愈少的同行去看。有那位研究漢朝的人會不厭其煩地去買一種晚明農業制度的書來看呢？這樣的學科分枝化却嚴重地影響到出版界本身。今日若沒有得到印書的財力支援，要出版一本專論或學報是不太可能的。部份原因是上述的情況加上日增的印刷成本。回顧十八、十九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情形則完全不同。當時，由名學者所寫的著作也是像商品一樣發行。只舉

一例，當儒蓮將部份佛教經典三藏譯成法文時，它們是以鐵路文庫出版物的性質當成商品一樣發行。兩袖珍型的小書適合任何想從巴黎乘火車到他地的旅客在途中自修之用。¹⁸在那個時代，作家及出版商都是以一般識字大眾為「讀者羣」，而不只是專家學者。

然而到今日，我們見到愈是專門性的著作或學報（儒蓮的書並非這類），就愈不可能以商品行銷的方式出版，因而就愈需要政府機構、大學或是基金會的資助。我們並不反對贊助出版——我們多多少少都從這樣的制度中受益——只是我們不可忘記這種資助總意謂著出錢的一方多少有其目的及限制。有時我們會聽說有些很好的手稿因其內容與大學出版社或是資助機構的編輯政策不合或某些不合時宜之處而不被接受。不過這並不是指中國小說、故事或詩歌的譯文，此類作品自有其市場，無需公家或基金會的資助，出版後偶而還可能小賺一筆。儒蓮的書也是翻譯，此處以他為例自是不十分切合，然而，從前學術著作之以商品行銷是無庸置疑的。

談到書籍，我們很可在此最後之際提到其文學及教育的價值。例如，我們很可以問是否這些漢學家所寫的書籍在內容或文學價值上超越其同行的興趣。歐洲學界頗有一些著作或翻譯十分成功，超越其本科的範圍而使得每一位識字大眾都能從中獲得益處，甚至對於整個世代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這類書有孟姆遜(Theodor Mommsen, 1817-1906)的「羅馬史」，他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人。另一位是布哈德(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成了世界上文化史的楷模。在二十世紀，荷蘭籍的惠辛嘉(Johan Huizinga, 1872-1945)所寫「中古時代的式微」(英譯名為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也曾改變了吾人對於十四、十五世紀歐洲的看法，也是一本經典之作。如果不久的將來歐洲漢學界有人也能寫成一本同樣份量的著作，而也成了一般識字大眾不可或缺的教育讀物，那將是一個階段的高峰。那時我們才可說漢學家們終於將中國放在她應該有的知識界的地位了。換言之，如果漢學家們一直還是有如目前的情況，只寫給同行參考，而不懷有更大的理想的話，雖然對於保存並發揚數世紀來的歐洲漢學傳統有其必要，但終究還是不太夠的。

註釋

1. 各國的漢學研究，本人選出了一些參考書目：Eduard Erkes, Bruno Schindler, "Zur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Sinologi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5/6 (1916-1918), pp. 105-115; Paul Demiéville, "Le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Centcinquantenaire de*

-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Paris 1948), pp.355-365;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Acta Asiatica 11(1966), pp. 56-110.
- 英國的有: Tao-sheng Ch'en, Paul S.I. Hsiao, *Sin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1967); T.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1989),
- 德國的有: Herbert Franke, *Sinology at German Universities* (Wiesbaden 1968) and "Sin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也包含歐洲的一般情況), in Otto Ladstätter, Sepp Linhart (eds.), *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Wien 1990), pp. 23-39.
- 荷蘭漢學概況: J.J.L. Duyvendak, *Holland'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tudies* (London 1950).
- 俄國則最重要的是 Petr Emilianovich Skachkov, *Bibliografiia Kitaia* (Moscow 1960)還有他的極棒的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avedeniia (Moscow 1977).
- 至於較老一點的文獻,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rpt. Taipei, 1966) 仍是不可缺的, 一本有用的參考書是 Donald Leslie, Jeremy Davidson, *Author Catalogues of Western Sinologists* (Canberra 1966).
2.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IX Si-St, p. 95a.
 3. 談到東西方接觸的書有不少, 較晚近的且附有很好的參考書目的有 Jacques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Paris 1982), 英文版叫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Cambridge 1985), 意文版是 *Cina e cristianesimo* (Casale Monferrato 1984); Jonathan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1984); David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1977), id.,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Wiesbaden 1985); Donald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1977); Franco di Giorgio, *Compendere e convertire* (Milano 1986); Howard L. Goodman, Anthony Grafton, "Ricci, the Chinese and the Toolkits of Textualists",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III, part 2 (1990), pp. 95-148.
 - 法國方面最好的是: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參見註1)。
 4. 對於這些趨勢的現代解釋, 可參見 Wolfgang Bauer 的兩篇文章: "Wirkliche und unwirkliche Chinesen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for Asian Studies* 19 (1988) no. 2, pp. 125-136, 以及 Die Bedeutung Ostasiens für Europa heute", in Otto Ladstätter, Sepp Linhart, August Pfizmaier (參見註1) pp.11-22.
 5. 參考 Skachkov, Ocherki (參見註1) 以及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76). 在1991年二月26-27, 列寧格勒曾舉行了一次討論會慶祝俄國東方正教教士團的275週年紀念, 參考 Ludmilla Dause, N.A. Samoylov in *Asie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no. 41 (Oct. 1991), pp.70-73.
 6. A. F. Wright,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1 no. 2 (April-June 1960), p.254 note 35.
 7. Max Scheler, *Vom Ewigen im Menschen* (Leipzig 1921) vol. 1, pp.94-95.
 8. A.F. Wright (參見註6) pp. 233-255. 至於 Demiéville, 參考他的 "Aperçu historique" p. 79.
 9. "Choix de sujets sinologiques", in *Hommage à Étienne Balázs*, XVIe Conge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Chinoises, Faculte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Bordeaux 1964), pp. 13-22.
 10. Wolfram Eberhard, *Das Tobereich Nordchinas* (Leiden 1949), p. 4.
 11. Gilbert Rozman (ed.), *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 Assessments of Recent Scholarship* (Ann Arbor 1984).
 12. Rudolf Vsevolodovich Viatkin, *Syma Tsian', Istoricheskie Zapiski* (Moscow 1972 ff.) 迄今已出版六冊。
 13. 參考 Vladimir Nikolaevich Nikiforov, "Segodnashniy den' kitaistiki FRG", *Narody Azii i Afriki* 1, 1977, pp. 239-242 (西德) id., *Ocherki zarubezhnoi istoriografii Kitaia: Kitaavedenie Anglii* (Moscow 1977) (英國)。我這兒還可再加一句, 亦即我對德國漢學史的研究在俄國有人加以評介, 如 N. L. Mamaeva, "Issledovaniia Gerberta Franke o nemetskoii sinologii", *Obshches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 Piatnaia nauchnaia konferentsiia, Tezisy i doklady III (Moscow 1974), pp. 485-491.
 14. *Opisanie Tibeta v uyneshiem ego sostoianii* (St. Petersburg 1828).
 15. *Description du Tibet traduite partiellement du chinois en russe par le P. Hyacinthe Bitchourin et du russe en français par M.***; soigneusement revue et corrigée sur l'original chinois, Complétée et accompagnée de notes par M. Klaproth* (Paris 1831).
- 這本書早就在1829—1830年的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中以數篇論文的方式出版, 這本書又在數年之後由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簡介其中文

內容：“Wei-Tsang too sheih, or Tibet in series of maps and descriptions”, *Chinese Repository* 9 (1840), pp. 26-46. 較完整而且仍很有用的英文譯本是由一美國人柔克義 (William W. Rockhill, 1854-1914) 翻成，名為：“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from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1891), pp. 1-133, 185-291.

16. *Trudy chlenov Rossijskoi dukhovnoi missii v Pekine*, 4 volumes (St. Petersburg 1852, 1853, 1857 and 1866).
17. *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 sein Volk, seine Religion, seine*

Institutionen, sozialen Verhältnisse etc. Aus dem Russischen nach dem in St. Petersburg 1852-57 veröffentlichten Original von Dr. Carl Abel und F. A. Mecklenburg, Kaiserl. Russ. Oberlehrer, 2 vols. (Berlin 1858). 從其前言中知本書曾打算出版英文譯本，但一直未見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德文本是由德裔的俄國文法學校的教師所完成的，這些人認為德語系的人士會對它有興趣而值得翻譯及出版。

18.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 inconnus jusqu'à ce jour suivis de fables et de poésies chinoises. Traduction de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1860).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2種

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漢學研究中心 主編

本論文集係民國七十九年七月，由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主辦、本中心協辦之「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合集，計有來自九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所發表關於敦煌學之論著三十七篇。

出版 民國80年(1991)8月

- 訂購
1. 臺灣地區每本新臺幣700元(精裝) Taiwan area NT\$700 per copy
 2. 其他地區每本美金40元(含郵費) Other areas US\$40 per copy (postage included)

漢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郵撥帳戶第07130991號 電話361-9132總機轉
20 Chung-shan S. Road, Taipei, Taiwan, R.O.C.
